

美国校外教育的早期实验：纽约市游戏场运动

位盼盼，张斌贤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儿童观念革新与城市儿童问题凸显的背景下，纽约市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游戏场运动。作为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校外教育运动之一，纽约市游戏场运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既有研究多从运动史或城市史视角切入，未充分阐释其深刻的教育意涵。系统梳理该运动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的历史文献，可以发现其演变的内在意义。纽约市游戏场运动在理念层面突破了“教育即学校教育”的传统观念，扩大了“教育”概念的内涵；在实践层面，该运动促使游戏场被纳入公共教育体系，从空间设计、课程设置与社会功能等维度反哺并重塑了美国公共教育。从学科反思的角度来看，对这一运动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打破教育史学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学校教育的藩篱，拓宽教育史的研究对象。

关键词：纽约市游戏场运动；美国校外教育；儿童观；游戏观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6)02-0095-08

19世纪中后期，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生物进化论等的传入催生了一场“儿童观革命”，儿童被理想化为“天使”“救世主”。与此同时，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引发了一系列严峻的儿童问题。遵循着对儿童的教育和塑造是实现未来社会变革最根本途径^①的思维逻辑，社会各界掀起了面向儿童的暑期学校运动（Vacation School Movement）、童子军运动（Boy Scout Movement）、游戏场运动（Playground Movement）等儿童“拯救”运动。其中，游戏场运动是进步主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校外教育运动之一，对美国社会的诸多方面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纽约市游戏场运动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了新的游戏场形式，扩大了游戏场的功能，创建了美国游戏场协会这一全国性机构，推动了运动从地方走向全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3年度教育学青年项目“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校心理干预的实践史研究”（COA230327）。

作者简介：位盼盼，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23）；张斌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① Susan Tiffin. In Whose Best Interest? Child Welfare Reform in the Progressive Era.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2, p.15.

然而,已有研究或是在论述全美游戏场运动时对其一笔带过^①,或是将其置于城市史(讨论该运动对城市建设的作用)与运动史(梳理该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的叙事框架内^②,未能深入阐释其作为校外教育实践的深远影响。事实上,纽约市游戏场运动不仅是进步主义时期社会改良的缩影,还是一场重要的校外教育实验。因此,本文将系统梳理纽约市游戏场运动的产生和早期发展,并从理念与实践两个维度,剖析其是如何打破“教育即学校教育”的传统观念,推动“教育”概念的重构,并最终反哺与重塑美国公共教育体系的。在此基础上,讨论由对该运动的研究引发的对教育史研究的反思。

一、改革动力:纽约市游戏场运动萌发的历史因素

(一) 儿童观念的变革与游戏观念的变更

殖民地时期,从“原罪论”的儿童观出发,人们谴责游戏“发生在魔鬼的作坊里,导致罪恶和放荡”^③。“启蒙时代”的到来酝酿了一种新的儿童观:“儿童是一个理性却尚未完成的存在”^④,因而他们的游戏必须受到监督。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对童年期的崇敬与圣化,使人们相信“儿童的天真、感性和想象力是需要保留而不是克服的品质”^⑤,因此对儿童的游戏也要采取宽容的态度。19世纪下半叶,随着幼儿园运动的开展,福禄培尔(Froebel)的游戏思想开始得到关注。“一切证据足以证明,福禄培尔精心地研究了他那个时代的儿童游戏”^⑥,“在福禄培尔之前,没有任何哲学家、教育家能够如此清晰地看到游戏对于教育目的的重要性”^⑦。从“上帝是万物的统一体”的思想出发,福禄培尔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激发和教导……人有意地地和自决地、完美无缺地表现内在的法则,即上帝精神”。^⑧要达到上述教育目的,首先需要把人的内在精神转化为外部表现,而要达成内外转换,实现二者的统一,必须借助活动这一中介物。由此出发,儿童自我活动,尤其是自发性的活动——游戏,被视为福禄培尔思想的核心。^⑨福禄培尔的思想对该运动的诸多改革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纽约市游戏场运动的领导者里斯(Riis)曾言:“我们的国家开始注意到福禄培尔的警醒:通过游戏,儿童第一次掌握了道德关系。”^⑩

① 祝贺:《美国游戏场运动的产生与发展(1880—1920)》,《外国教育研究》2018年第2期;刘慧梅:《城市与休闲的联姻——美国游戏运动探源》,《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Paul Boyer. *Urban Masses and Moral Order in America, 1820-192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Clarence Rainwater. *The Play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2。

② Mabel Macomber. *Playground Education and Agitation in New York*,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 1916(2); Cary Goodman. *Choosing Sides: Playgrounds and Street Life on the Lower East Sid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9。

③ Howard Chudacoff. *Children at play: A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6。

④⑤ Anne MacLeod. *From Rational to Romantic: The Childre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oetics Today*, 1992(1)。

⑥ [美]约翰·杜威著,赵祥麟等译:《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⑦ Joe Frost. *A History of Children's Play and Play Environment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0, p.29。

⑧ [德]福禄培尔著,孙祖复译:《人的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⑨ Molly Ransbury. *Friedrich Froebel 1782-1922: A Reexamination of Froebel's Principles of Childhood Learning*, *Childhood Education*, 1982(2)。

⑩ Joseph Lee. *Constructive and Preventive Philanthrop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2, p.vii。

19世纪后期，达尔文（Darwin）的《物种起源》消解了童年的浪漫情调，带来了“儿童是种族进化关键”^①的全新观念。儿童由此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游戏也随之被置于放大镜下考察。在这股游戏研究热潮中，谷鲁斯（Groos）和霍尔（Hall）在汲取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游戏观。谷鲁斯认为：人们需要一段较长的童年时光，以便通过游戏来“模仿和练习成人的角色，加强为未来生活做准备的本能。”^②霍尔则认为，游戏是对祖先行为活动的重演，通过“为本能提供一个无害的发泄渠道”^③，帮助儿童从“野蛮人”进化为“文明人”。谷鲁斯与霍尔的游戏观虽有差异，却共同推动了纽约市游戏场运动的兴起。纽约市游戏场运动的倡导者柯蒂斯（Curtis）借鉴谷鲁斯的理论，从生物进化角度论述了游戏对动物幼体的成长意义^④；霍尔的思想则深刻影响着约翰逊（Johnson）、亚当斯（Addams）等改革者对游戏的定义^⑤。

（二）进步主义时期严峻的儿童问题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城市化飞速发展，儿童游戏空间被严重挤压，街头成了他们唯一的去处。在芝加哥，每天有近6 000名儿童在十几个街区玩耍。^⑥纽约的情形更为严峻，贫民窟的大街小巷挤满了玩耍的儿童。拥挤的街道不仅夺去了儿童的生命，还腐蚀着他们的道德，导致“每年有近12 000名儿童被捕，即便是那些没有被捕的儿童，一旦进入贫民窟，也不能逃脱上法庭的命运”。^⑦

与此同时，美国迎来移民高潮。作为“欧洲移民进入美国的第一大港口”^⑧，外来移民占据了纽约人口的绝大部分。1860年，移民人口占纽约总人口的47.1%，到1890年，移民及其第一代子女已经达到纽约人口的81%。^⑨这些移民群体的到来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城市改革者认为移民父母难以胜任教育职责，主张将儿童从家庭中解救出来，培养为合格的美国公民。在此背景下，游戏场替代缺乏监管的家庭，成为向移民儿童传递美国中产阶级理念的首选途径。^⑩移民涌入加剧了住房紧张，在下东区的一间144平方英尺（约13.4平方米）的廉租房内，生活着5个家庭的20个男女老幼。^⑪廉租房恶劣的生活环境引起了改革者的担忧，他们认为，“如果城市里的年轻人居住于……廉租房里……住在肺结核盛行的地方，甚至乱伦都不

① Susan Tiffin. In Whose Best Interest? Child Welfare Reform in the Progressive Era.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2, p.21.

② Olivia Saracho and Bernard Spodek. Children's Play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sights from History and Theory,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 1995(3).

③ Stanley Hall. Adolescence: Its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s to Physiolog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Sex, Crime, Religion and Education Vol.1. New York: D.Appleton And Company, 1904, p.362.

④ Henry Curtis. The Play Movement and Its Significanc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7, p.1.

⑤ Dominick Cavallo. Muscles and Morals: organized playgrounds and urban reform, 1880-1920. Philadelphia: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p.75.

⑥ [美] 维维安娜·泽利泽著，王水雄译：《给无价的儿童定价》，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⑦ John Collier. Edward Barrows, The City Where Crime is Play. New York: People's Institute, 1914, p.13.

⑧ [法] 弗朗索瓦·维耶著，吴瑶译：《纽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页。

⑨ 林广著：《移民与纽约城市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⑩ Howard Chudacoff. Children at play: A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11.

⑪ Jacob Ris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2, p.11.

受惩罚的地方，他们不可能在身体上和道德上茁壮成长”，当务之急便是为儿童创设户外游戏场，因为“虽然剧烈的户外运动很难治愈这些疾病，但它可以减轻过度拥挤和不卫生的住房条件所造成的身体危害”。^①

二、演进历程：作为校外教育实验的纽约市游戏场运动

（一）校外教育实验的萌芽：游戏场教育价值的初显

面对混乱的城市环境，改革者宣称，要想解决城市街头严峻的儿童问题，就必须为儿童创设一个不同的环境。^②这个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游戏场。纽约市游戏场运动的发起者弗鲁曼（Vrooman）指出：“为改变社会制度，首先要改变人的态度，而人的态度又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产物。”^③由此，游戏场被视为塑造环境、改造社会的重要载体。

1890年年初，弗鲁曼从堪萨斯州来到曼哈顿，在目睹贫民窟儿童无人照管后，便投身游戏场运动。他以《纽约世界报》记者身份，采访罗格斯滑道附近居民，印证建游戏场的必要性：面砂公司职员抱怨孩子无处可去引发家庭紧张，殡仪馆人员称游戏场可减少儿童死亡，机械公司职员则警示孩子无去处威胁社会秩序与公共财产。在舆论准备的基础上，弗鲁曼又组织公民委员会（Citizen's Committee）在堆满废弃物的罗格斯滑道现场举行露天会议，意图通过环境本身的破败景象强化改革的紧迫性。通过采取上述措施，纽约市市议会于1890年通过了把滑道改造为游戏场的决议。^④虽然改造计划取得了胜利，但仍要等一年后才能实现这一承诺。^⑤面对此种状况，弗鲁曼又联合众多改革者将目光投向了公园，请求公园委员会在公园内增设游戏场，但由于反对者的阻挠，弗鲁曼等人的计划被再次搁置。

在滑道改造计划推迟且增设公园游戏场的提议被否决后，弗鲁曼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专门组织——纽约市儿童公园和游戏场协会（New York Society for Parks and Playgrounds for Children）来推动游戏场的建设。1891年，协会组建的第一个儿童游戏场——第92街游戏场开放，这个游戏场由一个看门人监督，配备了秋千、跷跷板、旗帜、沙堆等游戏设施。^⑥弗鲁曼认为游戏场成效显著，儿童由最初的“向他扔石头，砸碎地上的一切”到“明白了有组织的力量和好处，欣然接受游戏场提供的娱乐活动”，并且“他们运动的耐力明显增强……道德修养也有了显著提高”。^⑦这一转变，不仅彰显了游戏场在身体素质与道德规范上的教育价值，还标志着游戏场作为校外教育空间的功能已从理念走向实践，为后续更系统的校外教育实验奠定

① Dominick Cavallo. *Muscles and Morals: organized playgrounds and urban reform, 1880-1920*. Philadelphia: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p.3.

② Henry Curtis. *The Play Movement and Its Significanc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7, p.8.

③ Ross Paulson. *Radicalism and Reform: The Vrooman Family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1837-1937*.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68, p.78.

④ The Board. *Proceedings of the Board of Alderman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New York: Martin B. Brown, Printer and Stationer Nos.49 and 51 Park Place, 1890, p.169.

⑤ The Board. *Minutes and Documents of 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Parks*. New York: Martin B. Brown, Printer and Stationer Nos.49 and 51 Park Place, 1891, p.92.

⑥ Mabel Macomber. *Playground Education and Agitation in New York*,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 1916(2).

⑦ Walter Vrooman. *Play-grounds for Children*. *Harper's Weekly*, 1891(1794).

了基础。

（二）校外教育实验的发展：游戏场教育价值的官方认可

如果说纽约市第92街游戏场使改革者初步认识到游戏场的教育潜力，那么美国其他城市，尤其是波士顿游戏场运动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知。波士顿游戏场运动开始于1885年，运动的发起者最初只是希望通过设立游戏场，让贫民窟的儿童能够呼吸到户外的新鲜空气，但随着实践的深入，他们逐渐认识到“游戏场所具有的道德感召力以及对孩子们的温和、持续的关爱，对于他们性格的形成有极大的帮助”^①。

鉴于波士顿游戏场运动彰显的成效以及纽约市游戏场运动取得的前期成果，越来越多的政府人士开始参与其中。1894年，纽约州州长任命了廉租房委员会（Tenement House Commission）对纽约市的廉租房及附近的公园设施、公共学校进行考察。经过调查，委员会向立法机关提议：“在鲍厄里街（Bowery Street）和凯瑟琳街（Catharine Street）以东及第4街以南的地区，规划和兴建不少于两个小公园，且每个公园必须建造一个游戏场。”对于各公共学校中缺乏游戏场的现状，委员会向立法机关提议：“在以后的学校建筑中，如果没有一个良好而充足的游戏场，且游戏场的大小与该学校的学生人数不成比例，则不得建造该学校，现有的学校要尽快建立适当和充足的露天游戏场。”^②廉租房委员会的呼吁、游戏场运动几年来累积的势头，加之此一时期纽约市良好的政治气候，促使1895年《廉租房法案》顺利通过，该法案规定，“在纽约市下东区建立两个小公园，其中一部分用于公共游戏场”“所有新建的公共学校配备一个合适的游戏场”。^③

在廉租房委员会致力通过立法保障游戏场建设的同时，斯特朗（Strong）市长也责成小公园委员会（Committee on Small Parks）对纽约市现存的游戏场情况进行调查。委员会认为城市中缺乏游戏场，“将导致儿童除了在街上就找不到其他玩耍的机会……这不仅妨碍交通”“还将在儿童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人之间产生一种敌意，导致犯罪阶层的增长”。^④遵循着游戏场是维持社会秩序、遏制儿童犯罪的重要工具的思维逻辑，小公园委员会对纽约市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以地图、表格、人口密度等相关统计数据为依据，显示了纽约市1896年每个区的人口密度，每英亩儿童的密度以及每个区的儿童死亡率等。^⑤根据以上数据，小公园委员会筛查并绘制了纽约市的“动乱地区”，并建议在这些地区设立小公园和游戏场。此外，委员会还提议：“今后新设学校的游戏场，无论是在屋顶下还是在地面上，在放学后都要对公众开放，并成为附近居民的一般娱乐场所。”^⑥这一系列举措显示，游戏场已被官方人士视为维护社会秩序、预防犯罪的重要工具，其教育功能得到进一步确认。

① Massachusetts Emergency and Hygiene Association.Fifth Annual Report. Boston: The Association, 1889, p.32.

② New York State.Report of the Tenement House Committee As Authorized by Chapter 479 of the Laws of 1894.Albany: James Lyon, 1894, pp.73-74.

③ New York State Legislature, Chapter 298, Law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118th session, 1895.

④⑥ City of New York.Report of Committee on Small Parks.New York: The Martin B. Brown Company, Printers, 1897, p.1, 4.

⑤ Louise Ware.Jacob A. Riis: Police Reporter, Reformer, Useful Citizen.New York: D.Appleton-century Company, 1938, p.161.

（三）校外教育实验的反哺：游戏场被纳入公共学校体系

1890年，游戏场运动在纽约市艰难发端，历经近十年的发展，最终在1898年校内游戏场建设被纳入公共学校体系，由教育董事会下设的特殊学校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pecial Schools）与暑期学校和游戏场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Vacation Schools and Playgrounds）负责管理运营。同年7月，“大纽约市”的24所公共学校开放了暑期游戏场。委员会认为，“为了明智地帮助儿童组织和进行他们的游戏，监督和指导必不可少”^①，为此在各学校配备了多名游戏指导者。游戏场通常包含三个区域：可供下棋的安静游戏区（兼阅览室与流动图书馆）、配钢琴和沙箱的幼儿区，以及供大龄儿童游戏的场地。^②游戏场场内开设的活动项目包括唱歌、向国旗敬礼、体操、手工、足球等。^③

这些形式多样的游戏场吸引了众多儿童的参与。根据暑期学校和游戏场委员会的统计，游戏场每天的总出席人数从4 451名至17 026名儿童不等，仅就第25公共学校而言，每天参与游戏场活动中的儿童就达到771人，即便是24所学校中学生人数最少的第48公共学校，每天也有153名儿童参与，总的来说至少有30 000名儿童使用过这些游戏场。^④同时，来自各方的报告也使得公众进一步肯定了游戏场的教育价值。警方报告显示，尽管人口在增长，但在1898年夏天，在学校活动期间，在街上受伤或被捕的人数是自1895年后最低的。斯图尔特（Stewart）督学报告说这一年的暑期活动中青少年的犯罪率降低了50%。^⑤

鉴于1898年暑期学校和游戏场取得的巨大成效，教育董事会在1899年的暑假进一步扩大了暑期学校和游戏场的规模。随着投入的增加，游戏场的数量扩大到31个，工作人员也增加到400余人。^⑥与此同时，游戏场吸引的学生数量进一步扩大，最高峰时达到20 107人，最低时也有5 949人。^⑦1900年之后，暑期学校和游戏场项目继续发展。在20世纪的第一个夏天，教育工作者为这个项目花费了61 800美元。1901年，担任游戏场的教师增加到582人，开设的游戏场达到78处，平均出席人数激增到44 140人。^⑧

1902年之后，学校游戏场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学区督学惠特尼（Whitney）直接管理。在她的管理下，暑期游戏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902年开放了118个游戏场，雇佣了近千名教师，投入的资金更是高达59 065美元。同时，她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暑期游戏场进一步制度化。首先，更严格地选拔游戏场的教师。惠特尼认为：“暑期学校和游戏场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所雇用的教师和指导者的品质……（因而应确保）每个被雇用的人都是专家。”^⑨基于此，惠特尼建立了考核合格名单制度，淘汰低效教师。1903年，在申请教师职位的3 628人中，有1 735人被拒绝。^⑩其次，对学生实施申请注册制。“儿童于7月的前3日在游戏场上提出申请，领取入场证。这种形式是对无法无天的年轻人的必要遏制。当他们的姓名和地址由

①④⑥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Report on Vacation Schools and Playgrounds. New York, 1898, pp.29, 41-42, 85-86.

②⑤ Seth Stewart. Vacation Schools and Playgrounds. The Outlook, 1899(1).

③ Paul Monroe. A Cyclopedia of Education Vol.4.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3, p.729.

⑦ Joseph Lee. Constructive and Preventive Philanthrop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2, p.128.

⑧⑨⑩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nual Report of the City Superintendent of Schools to the Board of Education. New York, 1901, p.178, 65, 45.

委员会授权的代理人记录下来时，他们会更尊重这个地方”^①。再次，惠特尼对儿童游戏的形式、时间等进行了细化。^②最后，惠特尼还为游戏场的发展补充了新的元素。她认识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包括对所有心智和身体力量的训练——身体的力量、智力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当身体缺乏足够的营养时，是不可能发展体力的”^③，所以，惠特尼为游戏场的儿童提供食物来补充营养，以发展他们的体力。总之，惠特尼接管后，不仅进一步扩大了游戏场的规模，还通过建立入职教师课程培训制度、教师考核合格名单制度、学生申请注册制度等促使暑期游戏场管理的制度化。

三、分析与讨论：对纽约市游戏场运动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学界对游戏场运动兴起的原因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改革者出于慈善动机才发起该运动，目的是消除城市——工业联合体对穷人造成的危害；另一种则认为，改革者是为了“控制”下层阶级，维护自身的利益。^④虽然二者均从某一侧面揭示了该运动兴起的原因，但它们都没有认识到该运动是在多种因素，尤其是在游戏观的更新与进步主义时期亟待解决的儿童问题等综合作用下才得以萌发的。纽约市游戏场运动，自1890年游戏场兴起到1898年教育董事会接管游戏场，不仅是改革者努力的结果，还因为该运动充分彰显了校外教育的独特价值，打破了将“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的传统观念，重释了“教育”的意涵，重塑了进步主义时期的“教育观”，从根本上革新了以往对于“教育”的理解，为20世纪的教育变革奠定了观念基础。

当我们深入这一运动的内部对其进行审慎的探究时可以发现，长久以来被排斥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难登教育史学科研究大雅之堂的校外教育运动，却反哺并重塑了美国公共教育。它改变了公共学校的空间布局，根据规定，“所有学校都要有露天游戏场，否则不允许建校”^⑤；影响着具体的课程设计，“组织和设计游戏成为了学校的一项正规科目”^⑥；扩大了公共学校的福利功能，“使学校成为了一个社会机构”^⑦。这些变革表明，校外教育绝非教育的边缘地带，而是形塑学校教育体系的重要力量。

从学科反思的视角来看，在“线性历史观”与正统教育理论的双重影响下，大多数教育史学科研究者多将研究重点置于对学校教育或与学校教育相关的人物、思想等方面，而忽视了对不同历史时期各种“非正规”教育形式的研究，从而导致教育史成为了“学校教育史”^⑧。但是，我们应看到，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绝大部分人群是在学校以外的空间，以各种“非正规”的方式来接受教育的。^⑨因此，要解释人类教育的历史发展，必须超越学校的狭窄

①②③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nual Report of the City Superintendent of Schools to the Board of Education. New York, 1901, p.157, 162, 65.

④ 位盼盼、张斌贤：《美国游戏场运动百年学术史》，《现代教育论丛》2021年第5期。

⑤ [美] 埃尔伍德·卡伯莱著，陈露茜译：《美国公共教育——关于美国教育史的研究和阐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页。

⑥⑦ [美] 乔尔·斯普林著，史静寰等译：《美国学校：教育传统与变革》，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298页。

⑧ 张斌贤：《探寻教育史学科重建的出发点》，《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4期。

⑨ 张斌贤、王晨：《教育史研究：“学科危机”抑或“学术危机”》，《教育研究》2012年第12期。

天地而放眼于更广阔的世界。同时,要想真正深入学校教育的内部机制和本质之中,也必须具体全面地理解形式化与非形式化教育之间的联系与区别。^①

对这一校外教育运动的研究对我国教育发展也具有启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围绕教育强国建设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学校、家庭、社会要紧密合作、同向发力,积极投身教育强国实践,共同办好教育强国事业”。^②校外教育作为我国基础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关乎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因此,构建高质量的校外教育体系,整合及充分利用博物馆、文化馆等多样化的校外教育资源,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且紧迫的课题。在此背景下,对游戏场运动这一颇富成效的校外教育运动展开深入研究,也能为我国校外教育的实践与发展提供宝贵的历史镜鉴。

(责任编辑:张一鸣)

Early Experiment of Out-of-School Education in America: The Playground Movement in New York City

Wei Panpan, Zhang Binxian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enewal of view of children and the prominent problems of urban children, a vigorous playground movement emerged in New York City.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out-of-school educational movement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playground movement holds significant research value.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mostly approach i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ovement history or urban history without elaborating on its profound educational implica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mergence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movement and focuses on its intrinsic significanc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movement breaks through the narrow notion of “education is school education” at the conceptual level and expands the connotation of education. At the practice level, it leads to the inclusion of playground in the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and feeds back and reshapes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pace design, curriculum setting and social fu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ary reflectio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is movement can help liberate educ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from the confinement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broaden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the discipline.

Key words: the playground movement in New York City; out-of-school education in America; view of children; view of play

^① 张斌贤、王晨:《整体史观:重构教育史的可能性》,《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年第1期。

^② 习近平:《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人民日报》2023年5月30日。